

晚清稀见中外
关系史料丛书
丛书主编 周振鹤

1864年法国使华团 外交活动日记

〔法〕加略利
Joseph Marie Callery 著
谢海涛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崇祿不一

貴大臣當不斥為煩瑣也並僕

則人樂僕不侯所以諄諄要約者正是此意想

總之為政之道莫貴乎立法嚴而用意寬法嚴則人不犯意寬

內地傳教必致滋生事端誠不可行已備載公牘中豈不贅叙

我兩人彼此友愛之心此則不可不預為之防也至佛蘭西赴

隙之開轉由於此大無益於我兩國萬年和好之誼更有害於

國傳教之人以致違台傳播將以中國為漁獵皆約是將來鮮

身為匪週罪若中國繩之以法彼則捏詞赴訴於佛蘭西在中

氣不淳人多詐偽恐此教一經弛禁或不法之徒爭思藉教藏

多

014039322

D829.565

09

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丛书
丛书主编：周振鹤

1844年法国使华团 外交活动日记

「法」加略利 Joseph Marie Callery 著
谢海涛 译



1844Nian Faguo Shihualuan
Wajiao Huodong Rij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北航

C1726777

D829.565
09

项目统筹 李琳
责任编辑 李琳 陈艾利
责任技编 李春林
书籍设计 广大迅风艺术
徐俊霞 俸萍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44年法国使华团外交活动日记 / (法) 加略利著;
谢海涛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0
(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丛书 / 周振鹤主编)
ISBN 978-7-5495-4415-8

I. ①1… II. ①加…②谢… III. ①中法关系—
国际关系史—史料—1844 IV. ①D82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723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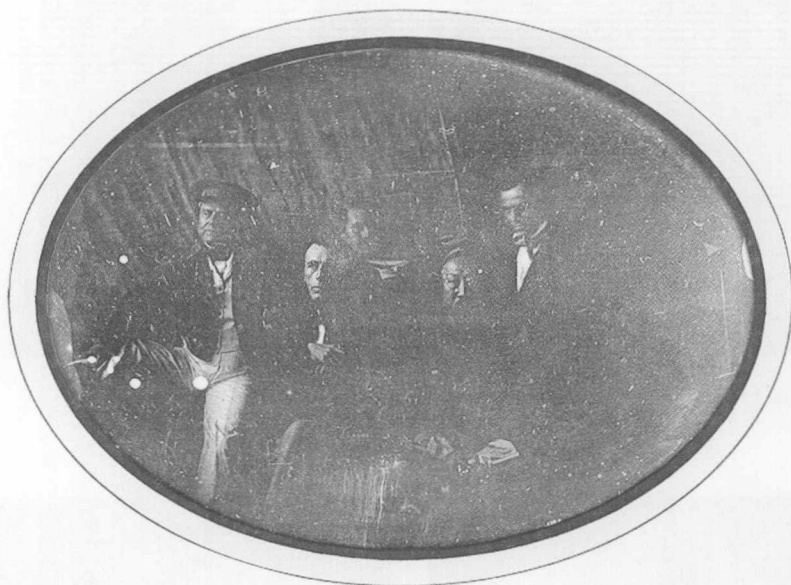
开本: 750 mm × 1 020 mm 1/16

印张: 24.5 字数: 325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签署《黄埔条约》时的合影（左起：士思利、拉萼尼、斐列勃、耆英、加略利。伊地埃摄于阿基米德号舰，1844年10月24日）

（ITIER Jules Alphonse Eugène. Les plénipotentiaires réunis sur le vapeur L'Archimède au moment de la signature du traité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 24 octobre 1844, Interprétation pour la lecture d'après daguerréotype original. 24 octobre 1844. N°inv. 76.3000.1, Musée français de la Photographie / Conseil général de l'Essonne - Benoît Chain）



加略利全家合影（1855年3月16日，由Benoît Callery先生提供）



法中谈判时的加略利（伊地埃摄于澳门，1844年10月22日，由Benoît Callery先生提供）



加略利墓穴 巴黎蒙马特墓地（谢海涛摄）

《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丛书》序



虽然史料不是史学,但无史料却成就不了史学。一切以论代史的著作自然遭人鄙弃,即使以论带史的思路也依然不是一条正确的治史途径。一切能推动历史学发展的著述无不以历史真正面貌的追索为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历史真面貌的呈现又无不以丰富真实的原始史料为基础,离开史实,历史无由存在。但通常,史实的追求是很不容易的。历史研究者容易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为歪曲了的史实所导引,进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但这种现象的产生有时并不都是历史研究者主观的错误,而可能是客观上的原因。就像看戏一样,我们只能看到台前的表演,看不到幕后的化装,我们只注意于主角的活动,而忽视配角甚至龙套的表现。即使我们很注意所有角色的表演,但我们总以为那就是历史的真实,而未意识到这原是在导演说戏之下的表演,说白了,他们是在做给摄影机拍摄的,而不是给观众表演的。即使戏剧是直接演给观众看的,但依然有两派表演理论的冲突,一派是本色的,一派是表演的。历史现象的发生有时也往往如此,我们只注意到各色历史人物的台前的表演,看不到他们在幕后的举止,不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真面目,而是舞台限制了我们。因此历史的研究不能不注意于搜集台前之



外的幕后史料,主角之外的配角表演,政治军事外交以外的经济文化往来,正式使节会谈之外的私人交往与接触,典籍公文记载以外的私人信函日记,冠冕堂皇演说背后的流言蜚语,只要有助于历史真相的披露,就无一不是可用的史料,就无一不可以用来使历史显露其本来的真相。本丛书所要展示的正是这一目的,以稀见的,但又不失为关键的史料的披露为范围,不论文献的语种,但以外文为主要对象。这些文献或以手稿形式存在,或虽已出版而被查禁,或未被查禁但却流传不广,或在外部世界虽有流传,而国人却少有所闻,尽量为之网罗。然主编者与出版社囿于所闻,见识未广,亟希望史学界内外有同好者加以推荐或自荐,以使本丛书能够臻于充实,至于有用,则编者幸甚,读者幸甚。

晚清历史之重要中外于今已有共识,身在其中之人,已深感其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身在今天之人或曰没有晚清哪来五四,或曰晚清乃中国现代化的准备期。然虽晚清去今未远,而资料之丧失或未曾开发者仍为数甚多。或者因当事者有所忌讳,不欲公刊;或者因有关当局以利益关系,一开始就被列为禁书;或者当时未显其为要闻,而在后世今日看来乃是解决历史疑案之锁钥。所有这些都应该尽量发掘,刊布于世,既充实史料之大库,复使历史真相更趋于明晰,甚或改变原来的历史定论。本社前已出版两种相关的丛书,一是《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一是《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目的都是为了使历史的面貌更加丰满真实。本丛书则更为直接,采用的尽量是未曾加工或相对原始或基础的史料,其于历史研究的作用恐怕对比以上两种丛书有过之而无不及。首批推出的几种材料都是法文原版,包括加略利有关中法《黄埔条约》谈判的日记、伯希和进入敦煌藏经洞的笔记等。加略利恐怕一般人不大晓得,但他却以译员的身份掌握了中法谈判的最机密的材料,所以他关于此次谈判的日记甫一出版就被禁行,为的是避免泄漏法国侵略外交的核心机密,所以此日记存世者不过十部而已。今天的读者自然会批判性地进行阅读,以为了解彼段历史的参考,复对其中的关

键人物如耆英有中文资料以外的新认识。至于伯希和,虽然在中国是无人不识,但他的敦煌藏经洞笔记却在生前从来没有准备刊行。原因不言自明,他不愿被人看成是小偷强盗。而即使是在给自己备忘的笔记中,他也留了一手,始终不透露他付给王道士多少钱。一百年后的2008年,这本笔记的原版通过掌握不同语种的三位人士的努力才得以整理印行法文版,但如果不加以汉译,相信许多读者是难以一亲其芳泽的。另外,他于义和团运动时正在北京公干,也留下一本分量不大的日记,同样具有参考价值。这三种书是首批要给大家介绍的。类似的外文著述为数不少,我们希望能够一部一部推荐给大家,步子不会快,但希望能一直走下去。是为序。

周振鹤

加略利生平

[依据 *La politique Missionnaire de la France en Chine, 1842—1856*, 第 248—249 页以及其他资料]

翻阅 1840 年左右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不难看出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在澳门最为活跃和著名的西方汉学家之一。然而时过境迁, 这位曾经被当时欧洲的汉学权威儒莲(Stanislas Julien)视为眼中钉的汉学家, 今天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从目前找到的资料看, 除去几篇小传外, 意大利学者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教授于 1986 年编写的 *Giuseppe Maria Calleri—Un Piemontese al servizio della Francia in Cina* ^①, 是唯一可以被称为加略利传记的文章。笔者经过两年的查找, 在巴黎主要的图书馆、档案馆中, 收集到一批关于他的资料。以笔者之见, 加略利对中国文化、历史、语言诸方面的了解远胜于同时代的任何一位生活在欧洲的汉学家。加略利同时对澳门附近和菲律宾的植物、矿物、地质做过众多调查, 是最早将欧洲的汉字金属活动字模带入澳门的人之一。他在某些方面做出的贡献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例如

① Pubblicazioni di, *Indologica Taurinensis*, Collana di Biografie e Saggi diretta da Oscar Botto II. Torino, 1986.

中国古老的树种棠梨(又称豆梨,即《诗经》中的甘棠、杜梨)就是被他引入欧洲的。该树因此以其名而得名(拉丁文:Pyrus Calleryana,英文:Callery Pear)。

加略利 1810 年 6 月 25 日出生于意大利都灵,都灵时为法兰西帝国波河省的首府。拿破仑战败后,意大利脱离法国。1815 年法国政府颁布法律,要求该地区居民对自己的国籍做出选择,而加父当时未曾为加略利选择法国国籍,致使加略利到 1847 年才发现自己并无法国籍,因此不得不提出入籍申请。加母是法国里昂人,加略利在里昂度过了自己大部分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833 年 9 月末,加略利进入巴黎外方会(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在尚贝里(Chambéry)的修道院。1834 年 12 月 20 日成为神父,并被指派前往朝鲜传教。1835 年 3 月 15 日离开巴黎前往法国西部港口勒阿弗尔(Le Havre),21 日离开那里前往澳门,并于同年抵达。加略利抵达澳门后,跟随葡萄牙籍遣使会士江沙维(J. A. Gonçalves)学习中文,曾用中文名范尚人,同时在两名朝鲜修士的指导下,学习朝鲜语。1838 年 7 月 14 日—1838 年 9 月 8 日,和遣使会士罗伯济(Claude Guillet)搭乘英国走私鸦片船前往宁波,以期从那里上岸,通过中国大陆进入朝鲜。抵达宁波海域后未能登陆而返回澳门。1839 年到菲律宾考查当地的植物和鸟类。1841 年 10 月向外方会提出辞呈,并返回巴黎。在巴黎期间,他结识了年仅 18 岁的女友盖尔格热(Louise Quelquejeu)。

1842 年 11 月 18 日加略利被任命为法国驻华领事馆翻译,并于次年和盖尔格热返回澳门。1844 年 8 月 15 日—1846 年 3 月,担任拉萼尼(Théodose-Marie de Lagrené)使团翻译。因为他在法中《黄埔条约》和对基督教弛禁等问题,以及在比利时使团和耆英的各项谈判中的贡献,被法国^①和比利时政府^②分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① 1846 年 7 月 8 日, Chevalier de Légion d'Honneur.

② 1846 年 8 月 25 日, Chevalier de l'Ordre de Léopold.

加略利在这一时期的日记和他编撰的法中双方函件、书信汇编(即译后记中所谓的《书信汇编》)^①为研究当时的法中谈判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1846年3月30日,加略利从香港乘船前往法国,随身携带了耆英转交的道光皇帝关于对基督教弛禁的上谕,并将中文师爷刘成禧一并带往法国。

1847年8月13日,加略利被任命为路易一菲利浦国王的御前中文翻译。同年11月,加略利发现自己早在1815年就失去了法国国籍,因此不得不提出申请,希望能得到路易一菲利浦的恩准,恢复自己的法国国籍。当时的内阁首席大臣兼外交大臣基佐(François Guizot),1847年11月16日专门致信法律大臣,希望司法部门予以支持。按照程序,司法部指示巴黎警察局对申请人的品行等进行调查。然而,巴黎警察局1848年1月21日的报告,对加略利的评价极为恶劣,说他是“一个没有道德,不值得政府信任和施与任何优惠的人”^②。这个结论,无疑和加略利还俗,以及和教会闹翻有关。祸不单行,几个星期后,法国政局骤变,二月革命迫使路易一菲利浦退位,加略利的保护人基佐下台,流亡英国,加略利入籍一事因此被束之高阁。这样,虽然加略利在入籍申请时说自己从未想过他不是法国人,然而事实上,他最终是意大利籍,这大概是加略利从未出现在法国汉学史中的原因。

内部政局的动荡导致法国在那一时期无暇顾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拉萼尼使团连最后的汇报、总结都做得匆匆忙忙,草草收场。更有甚者,随后成立的第二共和国大幅削减政府预算,使大批公职人员失去了工作和经济来源,加略利也未能幸免,中文翻译一职于1849年4月21日被外交部取消。

1852年1月31日,加略利官复原职,重新出任拿破仑三世的御前中文翻译。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的1862年,尽管他一直享受着每年8000法郎的俸禄,但几乎没有留下和该项工作有关的记录,即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

^① *Recueil de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relatifs à la Légation Française en Chine, traduit du Français en Chinois et du Chinois en Français par J. M. Callery, Secrétaire - Interprète de la Légation.* Macao 1845 et 1846.

^② 法国国家档案馆, BB11, 530, Dossier 4591 X 4.

后,也不曾有人咨询过他的观点。此外,加略利既不是代表当时法国汉学最高水平的亚洲协会(Société Asiatique,或译为亚细亚协会)的成员,也未在该协会的杂志 *Journal Asiatique* (或译为《亚细亚学报》)中发表过任何文章。仿佛人们全然忘记了这位当时在法国,甚至在欧洲大陆唯一能够对汉语运用自如的中国通的存在。

笔者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中仅找到加略利在这一时期与其本职工作相关的两份文件。一件是1859年1月10日致外交大臣的信件,提议由他来为外交部培养一批中文翻译。第二件是1860年7月25日翻译的一份来自中国天主教徒的请愿书,在请愿书中教徒们请求拿破仑三世的保护。关于加略利被忽视的原因,笔者认为至少有四个。首先,最初设立这个职位的原因,是外交部认为中国将会向法国派驻使团,然而几年过去,中国使团迟迟不见踪影,因此御前翻译自然就没什么作用。其次,为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弛禁乃是前朝(路易一菲利浦、基佐)的成果,因此加略利很难以此邀功。再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欧洲人对中国的日益了解,发现中国人并非像拉萼尼、加略利所描述的那样崇拜法国,对法国人怀有特殊的好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下广州府后,英军所发现的耆英密奏,更让欧洲人感到中国官员的虚伪,因此拉萼尼、加略利等人当年对耆英、黄恩彤等人的美誉与赞赏,多少成为坊间的笑料。最后一点,1854年9月和1855年2月,法国公众教育部和外交部相继收到两封来自一位名为 Le Clerc 的告密信^①,向政府揭露加略利当年身为教职人员时和情人同居,然后脱离教会等历史,并且控告加略利绕道英国与中国走私,以至于能过着与他的公职收入不相称的奢侈生活。和今天人们对还俗的出家人所具有的偏见一样,在当时的西方社会,脱离教会的神职人员为大多数人所不齿,其道德品质自然会遭到人们的质疑。尽管外交部对这些告密信未做出任何回应,也未曾对加略利有过任何处分,然

^① Note secrète sur l'Abbé Calleri,原件藏于法国外交部档案馆, Dossier des Personnels, # 710, Callery。经笔者考证,这些匿名信均出自儒莲之手。

而这些信件却伴随了加略利其后的整个公职生涯,它们所起到的负面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在汉学方面,加略利的作品不多。最具代表性的是 *Systema Phoneticum Scripturae Sinicae*(《字声纲目》),此著在鸦片商颠地(Lancelot Dent)的赞助下,于1841年由加略利自行在澳门刊印出版。《字声纲目》是西方汉学界第一本研究汉字声符的专著,而且也是历史上第一部对当代汉字的声符进行辨别、归纳、排序的著作。^①这部著作作为西方人研究、学习汉字另辟蹊径。以声符为分类标准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视为在部首、读音之外的第三种归纳、检索汉字的方法^②,它对后代研究汉语汉字的西方学者有过诸多启发。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曾经认为:“西方第一个真正研究汉字声符的人是加略利,他的《字声纲目》在当时可谓是一部优秀著作。”^③就连极少美言他人的戴遂良(Léon Wiegier),也认为“研究声符是学习汉字的最佳方法”^④。

在完成了《字声纲目》之后,加略利计划按照自己所提出的声符分类原则,以《佩文韵府》为基础,编撰一套名为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汉文总书》)的汉字字典。加略利的设想极为庞大:全书计划分20卷,每卷600页,使之成为“一部让欧洲彻底了解中华帝国字符中所蕴含的无比寓意的,不仅限于汉字表面意思的,而且要给出所有和这些字符相关知识的百科全书”^⑤。该字典的头卷问世后,得到卫三畏等人的好评。但是,由于计划过于庞大,同时又受到巴黎汉学界的干扰,最终在出版了第

① 清人对汉字声符有过大量探讨,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段玉裁的“同谐声者必同部”和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但是清儒的目的在于古韵,而加略利的研究以《康熙字典》所收之字为基础,旨在对当时的读音进行归纳。

② 卫三畏:《汉英韵府》,1903年,上海。

③ B.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Introduction, p. 4.

④ Léon Wiegier, *Caractères Chinois*, p. 22, 献县, 1924年。

⑤ J. M. Callery,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 J. - M. Callery, auteur du *Systema Phoneticum Scripturae Sinicae*. p. V. Paris, 1842.

一卷后,这部被哥士耆(Alexandre Kleczkowski)称为“本应成为法国汉学的巅峰之作”^①的著作便告夭折。

加略利第三项和汉学有关的工作是首次将《礼记》译为西文,此书于1853年由都灵皇家印书局出版。加略利所依据的是范紫登的《礼记体注大全》,并非传统的《小戴礼记》。这个经过筛选和删除了大量细节描述的版本,再加上有中文师爷刘成禧的帮助,使这项翻译变成一件相对容易的工作。理雅各(James Legge)在翻译《礼记》时,曾经大量参考过加略利的翻译,并对其评价甚高。^②

此外,他和伊万(Melchior Yvan)大夫合著的 *L'Insurrection en Chine,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la prise de Nankin*^③ 是加略利文著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本,曾被译成葡萄牙、英、德等多种语言。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让欧洲人充分认识到当时中国的真正面目:这个泥脚巨人不过是块任人宰割的鱼肉,已经不再具有加略利最初奔赴澳门时的神秘和魅力,相关中国的学问在欧洲学界毫不卖座,而法国仅有的一点资源被掌控着法国汉学的儒莲死死地扣在手中,使他人无有问津的可能。从此,加略利彻底埋葬了自己关于汉学的计划,而把精力转向其他方面。1854年,加略利的最后一部作品问世,介绍都灵皇家画廊收藏的著作——*La Galerie Royale de Peinture de Turin*。

加略利1843年返回澳门时,从巴黎斥巨资购买了一套印刷设备和刚问世不久的、由法国刻字匠勒格朗(Marcellin-Legrand)创造的金属活体汉字字模。返回澳门后,他组装并培养当地工人使用这些设备,成立了自己的印刷

① A. Kleczkowski, *Cours graduel et complet de Chinois parlé et écrit*. pp. 91—92, Paris, 1876.

② J. Legge,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XXVII. Preface, p. xiii. at th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885.

③ 此著有中文译本,即《太平天国初期纪事》,徐建竹据英译本再译。

工坊。1844 年 11 月 28 日,加略利成为都灵科学院院士^①。

1861 年 7 月 10 日,在同居了十九年后,加略利和盖尔格热在巴黎南部远郊的 Lisses 正式结婚,他们共育有四子三女。1862 年 6 月 5 日,加略利因动脉瘤破裂,上午 10 点突然在 Saint Martin Les Voulangis 镇^②的乡间别墅过世,6 月 10 日在巴黎 Saint Philippe du Roule 教堂举行葬礼,随后被葬于巴黎蒙马特墓地^③。

① Accademia delle Scienze di Torino.

② 现改名为 Voulangis,在巴黎东部。

③ 蒙马特墓地,第 19 区,第 1 行,第 22 号。

目 录



1844年

8 月 13 日	1
8 月 14 日	2
8 月 15 日	2
8 月 16 日	10
8 月 17 日	13
8 月 18 日	19
8 月 19 日	20
8 月 20 日	25
8 月 21 日	29
8 月 22 日	31
8 月 23 日	35



8 月 24 日	48
8 月 25 日	50
8 月 26 日	50
8 月 27 日	52
8 月 28 日	53
8 月 29 日	62
8 月 30 日	68
8 月 31 日	69
9 月 1 日	74
9 月 2 日	80
9 月 3 日	95
9 月 4 日	103
9 月 5 日	105
9 月 6 日	106
9 月 7 日	108
9 月 8 日	109
9 月 9 日	110
9 月 10 日	118
9 月 11 日	122
9 月 12 日	128
9 月 13 日	130
9 月 14 日	132
9 月 15 日	132